

抗战时期 周恩来统战思想 和实践论文选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重庆大学出版社

抗 战 时 期

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

论 文 选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重 庆 大 学 出 版 社

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论文选

中共重庆市委統一战綫工作部

重庆市統一战綫理論研究会

責任編輯：黃立強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后勤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字数：216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統一书号：3408·1 定價：1.85元

內 容 簡 介

中共重庆市委統战部和重庆市統战理論研究会編輯的《抗战时期周恩来統战思想和实践論文选》，是從紀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所举行的“抗战时期周恩来統战思想和实践討論会”上提交的論文中选择部份編輯而成，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從事統战工作的第一个模范，他在参与制定和实现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是他当时率領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长期战斗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开展各方面的統战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周恩来同志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統战活动，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丰富理論和伟大实践是留給我們宝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学习、借鉴这些宝貴經驗，对于发展时期的爱国統一战綫，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进行的統战活动，方面很廣，內容丰富。选編的論文，涉及到他在这一时期的統战思想和实践的許多方面，諸如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貢獻；对国民党上层人士、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际友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統战工作；对文化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工运、妇运等方面的統战工作；周恩来以誠相待，既关心同志，又坚持原則的交友之道，等等，共二十一篇，十七萬余字。論文所反映的周恩来同志的統战活动，材料翔实，并從理論上作了初步探討。可供党政軍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統战部門的廣大干部閱讀参考。

出版說明

为紀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們举行了“抗战时期周恩来統战思想和实践討論会”，与会同志提交了许多論文，为反映討論会的成果，引起更多同志对研究周恩来同志統战思想和实践的重視，推动統战理論的研究深入开展，特选择了部分論文編輯成《抗战时期周恩来統战思想和实践論文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結的結果。周恩来同志是我党從事統战工作的第一个模范，他在参与制定和实现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是他当时率領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长期战斗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开展各方面的統战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周恩来同志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統战活动和提出的統战思想，在他一生的革命業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毛澤东思想关于統一战綫的学說，是留給我們的宝貴精神财富。探討、研究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的統战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实现統一祖国，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进行的統战活动，方面很廣，内容丰富。这本論文选只是從某些侧面反映了他当时工作中的若干方面或片断，并從理論上进行了初步探討。全面搜集、整理、研究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的統战理論和实践，是一項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还有待于繼續努力发掘、开拓和提高，以期更好地总结历史經驗为现实服务。

謹以此书，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十周年！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論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杨光彦 陈明敏 (1)
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 重大贡献	王才强 (18)
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 发展的重大贡献	张书其 (31)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维护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卓越贡献	郑洪泉 (44)
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上层的 统一战线	任孟良 (56)
抗战时期周恩来争取地方实力派的 卓越贡献	梁 余 (77)
抗战时期周恩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 派的理论和实践	彭承福 (90)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民主党派的支持 和帮助	李 蓉 (104)
略谈抗战期间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 织的形成和发展	邓后炎 (125)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国统区文化战线 上的统战工作	尹从华 (137)

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重庆民族工商	
界的统战工作·····	廖申科 (155)
缅怀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工商界	
上层人士的若干教诲·····	余明厚 (176)
抗战时期重庆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	
和新时期工会的统战工作·····	舒文云 黄 斌 (184)
周恩来与国统区妇女统战工作·····	何 为 (204)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外国人士的统战	
工作·····	王光荣 (217)
原则之坚定性与政策之灵活性的高	
度结合·····	贺德群 张新华 (235)
统战工作要富有“人情味”	
——忆抗战期间与周恩来同志会见的感受	
·····	刘宗宽 (244)
周恩来的交友之道	
——试论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关于交朋友	
的理论与实践·····	胡康民 (250)
认真学习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	
努力做好新时期统战工作·····	刘崑水 (263)
对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	
的几点认识·····	钟 宜 (277)
学习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思想和实	
践的现实意义·····	范浔华 李 蓉 (292)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杨光彦 陈明钦

四十年前，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奏起了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抗击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滴雪了多年的民族耻辱，树立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范例，显示了中国人民蓬勃兴起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时，毛泽东就评价了它的伟大意义，指出：“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历史已经雄辩地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在风云变幻、寇深祸急的三十年代，他和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袖们一起，运筹帷幄，殚精竭力，奔走呼号，折冲樽俎，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

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2]情况确是这样。无论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或是将这一策略路线付诸实践，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发表，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萌芽时期。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的统一战线口号，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联合抗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红军愿意与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个宣言把统战对象从劳动群众扩展到一切抗日军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吉鸿昌等合作，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开展著名的察哈尔抗战；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领导人同红军达成抗日作战协定等等，都反映出这一宣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党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停止一切内

战，共同对日作战；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联合“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4]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纲领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作为党和红军重要领导人的周恩来，积极参与了这段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精神，表示工农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同年初，当蒋介石在日本侵略军配合下，调集军队大举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时，周恩来起草了用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过去双方协定”，本着“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神”，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具体建议，鼓励他们为反日反蒋“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6]

从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发表到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形成时期。是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中日矛盾愈益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八月一日，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无论各党派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7]宣言申明：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充当这样的政府和联军的发起人。与前述文件相比，“八一宣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注意到上层统一战线，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业、各个民族以及海外侨胞的联合，把地主、资产阶级也包括到统一战线里面。因此，“八一宣言”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它却不失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基本形成的标志。

同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这是继“八一宣言”之后，以党中央决议的庄重形式，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紧接着，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策略路线的形成。

周恩来出席了党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他和毛泽东等一起，为两个会议的成功，为实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贡献了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力量。

瓦窑堡会议后，党为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中央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适时地调整了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而逼蒋抗日，又由逼蒋抗日而联蒋抗日，依次递进，使整个过程形成三个发展阶段。逼蒋的目的是为了联蒋；不逼蒋也不可能出现联蒋。因此，放弃反蒋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我党在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中，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建议，并把蒋介石也包括在促其“觉悟”联合抗日的范围内。这是我党的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的开始。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正式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救亡图存。九月一日，党中央向全党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8〕}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

能”。^[9]另一方面，正如周恩来在致蒋介石信中所说：“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的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10]此其一；其二，正由于蒋是“最高领袖”，因而在国民党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采取逼蒋抗日方针，就更有利于团结和争取国民党中可能抗日的人士。

周恩来在参与制定逼蒋抗日策略方针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四月九日，他同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时，张谈了由于自己的处境，联合抗日可以，公开反蒋不行，建议是否可用内劝外逼、“内外夹攻”的方式促使蒋介石抗日。周恩来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正是在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全面研究，并参考这个新情况之后，决定放弃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

二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和逼蒋抗日方针指导下，党中央本着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原则，采取许多有力措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下层统战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各行各业中广泛组织抗日救国会，联合其他救亡团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二是通过阵前喊话，联欢，教育释放俘虏，派人到对方军队中作宣传、办训练班等方式，启发国民党士兵的爱国觉悟，争取他们加入联合抗日的行列。

上层统战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团结各界爱

国领袖和知名人士。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先后致书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蔡元培等，热情赞赏、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主张和活动。周恩来也在给知名教育家张伯苓的信函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一言为天下先”，“以促其成”。

第二，是直接开展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冬，蒋介石迫于形势，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通过三条渠道，沟通与我党的接触，要求举行谈判。我党抓住这个机会，派出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最初的接触和谈判。周恩来为推动谈判的进展，于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九月间，先后给国民党参与谈判的幕前幕后人物写信，宣传我党的联合抗日主张，鼓励他们为此努力。他在给谏小岑的信中，提出国共双方“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要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11]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尽管如此，我党为促使蒋改弦易辙，实现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仍努力不懈。九月下旬，周恩来直接给蒋介石写信，敦促蒋“从过去的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12]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九名红军将领，又致书蒋介石，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免“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3]

第三，是争取地方实力派。我们愈能争取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就愈能达到逼蒋抗日的目标。对各地许多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我党采取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直接

写信、发表谈话、派出重要干部当面恳谈等方式，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晓以团结抗日大义。其中，又把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十七路军），作为这一工作的重点。

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所谓“杂牌军”。国民党营垒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的矛盾一向很深，蒋介石对一些地方实力派历来居心叵测，总是伺机打击吞并。蒋让张、杨所部在西北“剿共”中打头阵，用的就是一石两鸟手法，旨在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异己。当他们在“剿共”中受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撤消一些受创部队番号，减发军饷。严峻的事实教育了张、杨及其将领，“剿共”非但没有出路，继续“剿”下去反而会把自已的老本丢光。两军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更是厌倦内战，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大都有失土亡家之痛，妻离子散之苦，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为强烈。基于此，党中央确定把争取张、杨两军的工作作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把结成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争取工作，多管齐下，形式多样：既做上层工作，又做下层工作；既有公开活动，又有秘密联系。为了加强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在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设置了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二、三月间，由经我教育释放的东北军

团长高福源沟通，我党代表李克农两赴洛川，先后会见王以哲军长和张学良。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看法。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于四月九日到延安同张会谈。在会谈中，他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全面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真听取了张学良的意见，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张提出的问题。双方对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初步协定。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合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十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书张学良，重申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请他将我党主张转达蒋介石，以便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使张学良愈益感受到我党抗日救国的诚意。

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我党又通过三条线积极开展争取西北军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双方商定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不仅如此，我党还通过在两军工作的干部，做了许多工作，消除张、杨之间的疑虑，促进两军的相互了解和团结。

这样，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西北地区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号召力，而且势必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苦谏”无效之后，被迫采用“兵谏”的办法，扣留了到西安

逼他们继续“剿共”的蒋介石和随行的十余名高级将领。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并电邀我党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的爆发，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和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局势纷繁紧张，斗争激烈复杂。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综观全局，科学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参与了这一英明决策。十五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十九日，再次通电，向南京与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四项具体建议。

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肩负党中央的重托，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立即展开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周恩来首先分别同张学良、杨虎城举行会谈，向他们详细说明我党对事变的态度，明确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动，并分析了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他强调应当竭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解决，从而实现全国抗战的前途。至于蒋介石本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释放他。周恩来的透彻分析和恳切言辞，使张、杨茅塞顿开，心悦诚服，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我党代表团还通过各种方式做张、杨两军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耐心开导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方针。

二十一日，党中央、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事变发生后